

中国人社会地位的获得^{*}

——阶级继承和代内流动

张翼

Abstract: Depending on the data of The Changing of China's Social Structure in 2001,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attainment of Chinese social status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 by linear regression and logistical regression. The paper finds that: (1) the Chinese society is becoming opening instead of blocking out; the achieved factors are much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ascribed; but some boundaries of classes need to be opened, such as Hukou system, etc. (2) in the factors of the achieved, educational capital is becoming more important; (3) the attainment of social status for sons and daughters are all affected by their families class origin instead of only sons.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定位

社会学阶层继承和地位获得的研究范式,源起于先赋性与后致性理论。基于此,社会分层学家提出的操作性假设是: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在等级有序的阶层结构中获得的社会位置,主要由阶级出身和家庭背景所决定,这个社会就是封闭型社会(或传统型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子女主要继承着父亲的阶级位置,阶级继承是社会成员获得社会地位的主要形式;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阶层位置主要取决于自己后天的努力(如自己学习得到的受教育水平和技术技能等),这个社会就是开放型社会(或现代型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子女的社会地位主要由自己努力取得的人力资本所决定,代内流动是社会成员获得社会地位的主要形式(家庭背景对子女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教育”这个中介变量上)。正如许多社会学家已经认识到的那样,任何社会、任何国家在自己历史的具体时点上,都不可能处于完全封闭或完全开放的两极,而可能介于这两极之间的某一点上。

对这一理论的定性研究给出过经典分析的社会学家很多,但对定量研究做出实质性贡献的社会学家,当首推美国的布劳与邓肯。他们在1967年出版的《美国的职业结构》一书中,以“16岁时父亲的职业地位”、“父亲的受教育水平”为先赋性变量(继承性因素),以被访问者(年龄在20-64岁的男性, N=20700)获得的“受教育水平”、“初职职业地位”和“目前职业地位”为自获性变量(后致性因素),并以邓肯发明的社会经济指数量化了父亲与被访问者本人的职业地位,以路径分析递归模型计算了各个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对个人“目前职业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尽管家庭背景(父亲的职业与受教育水平)给美国男性的职业地位获得以显著作用,但在比较了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作用力的强弱后,他们解释说,美国是一个相当开放的社会——因为在决定美国在职男性社会地位获得的因素中,由个人努力所达到的“受教育水平”要比来自于“父亲职业地位”的作用更强。基于此,布劳和邓肯将他们的研究结论推广为:越是工业化社会,先赋性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就越弱;越是传统型社会,先赋性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就越强。但是,即使如此,在美国这样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较高的西方市场化国家,来自于父亲的先赋性因素,对子女职业地位的获得仍然具有虽然微弱但却显著而直接的影响(Beeghley, 1996: 70)。由此可以看出,布劳—邓肯模型的具体发现如下:

* 本文在修改过程中,陆学艺研究员、边燕杰教授和李培林研究员等提出过许多有益的建议,特此致谢。但文章中存在的不当之处,概由作者本人负责。

第一,伴随社会的工业化与职业分化,子女社会地位的取得将越来越依赖于自己的受教育程度,即工业化水平越高,职业分化得越细越密,受教育程度对人们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就越大。第二,以父亲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为代表的家庭背景对人们职业地位的获得,仍然具有显著影响力。也就是说,工业化并没有完全消除家庭背景对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

而西方某些社会学家在对中国人社会地位获得状况的研究中,却得出了某些特殊的结论。其间,白威廉(William Parish)的研究最具影响力。白氏通过对中国大陆1972—1978年间迁居香港的132位移民的访谈,得到了他们的2865位邻居的数据。在对这些数据的分析中,白氏发现:对于那些在“文革”前(1966年前)就年满20岁的同期群案例来说,父亲的“受教育水平”与“职业地位”对子女的受教育水平,父亲的“职业地位”与“阶级出身”对子女的“职业地位”获得等,具有显著影响作用。但对于那些在“文革”时期才年满20岁的同期群案例来说,作用却并不显著。^①白氏的结论是:“文革”这一社会事件对中国社会分层结构进行了彻底的清洗,使得当时中国中上阶层父母对其子女“受教育水平”与“职业地位”的提高无所助益。在将中国调查资料的回归方程系数与波兰、芬兰和挪威等国家的同类型数据作了某种程度的比较后,白氏的结论是:即使考虑到“文革”前家庭背景对子女社会地位获得的显著影响,这种来自于父辈的作用力也显得微乎其微,从而使中国从建国初期比较平缓的社会分层结构转变为“文革”时期的“非阶层化”(Destratification)大平均主义结构(Parish, 1984: 84—120)。

白威廉的文章发表之后,谢文和林南于1983年在北京的调查(N=1774)(Xie & Lin, 1986)、林南和边燕杰于1985在天津的调查(N=1000)等进一步证实:父亲的职业地位既对人们的初职地位获得毫无影响,也对人们目前职业地位的获得缺少明显作用。与此同时,从匈牙利和波兰收集到的资料也很少显示出父亲地位在子女地位获得方面有直接影响(林南、边燕杰, 2002: 83—115)。这些定量研究似乎证明了这样一个论断: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其政策配置,使受教育机会倾斜于工人和农民的子女,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平等化。正因为这样,许多研究阶级结构和社会分层的社会学家才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分配方式所形成的社会流动,与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下所形成的社会流动有着重大区别。这就对以布劳—邓肯模型所代表的社会地位获得假说(或曰工业化假说)的普适性形成事实质询,即为什么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以父亲的“职业地位”和“受教育水平”所代表的先赋性因素,分别对子女的“职业地位”获得和“受教育程度”获得具有显著影响作用,但在工业化程度较低的中国及另外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却不显著了呢?

不满足于既定的学术解释,林南与边燕杰将“工作单位部门”这一具有国家社会主义特色的指标作为中介变量,置于职业地位之前进行检验。研究发现,虽然父亲的职业地位对子女的教育和职业地位获得缺少统计意义的影响,但父亲的“工作单位部门”却通过对儿子“工作单位部门”的作用而影响了儿子的初职地位获得,但女儿却无此殊荣。他们的结论是:女性主要靠接受较高的教育才能进入核心部门(国有单位),男性则深受家庭背景的影响。即是说,似乎在代际传承上,父亲更偏爱自己的儿子,存在相当程度的性别歧视,这与白威廉研究中“对男性在教育、职业地位获得方面的性别优势的削弱”的结论多少有些不同。值得注意的是,林与边还加入了另外一个中介变量——“党员资格”,将其在路径分析中置于初职地位之后,现职地位之前,结果发现:党员资格的取得,使党员有更多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这与魏昂德(Andrew G. Walder)的研究取向虽不同,但在对党员身份的关注上,则有许多相近之处。

如果说林与边的这一“政治经济体假说”强调了父亲所在“单位部门”对子女就业所在“单位部门”的影响,并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中国社会的先赋性因素对儿子社会地位的获得也具有作用力的话;那么,李路路利用1998年在北京、无锡、珠海三城市的3975个有效案例所做的对数线性模型分析,则着力强调了中国社会的阶层继承性与阶层间流动的社会封闭性。按照作者的解释,这种封闭性主要表现在:一

① 可是在白威廉的文章中,作为自变量的父亲“职业地位”对作为因变量的子女的“职业地位”的非标准回归系数是显著的,只是系数值有了某种程度的降低。

方面,在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鸿沟(这一点与西方社会流动研究的发现基本一致)^①;但另一方面,即使是在“高级单位负责人/高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这三个较高阶层存在流动关系的前提下,各阶层内部的继承性也是其主要特征。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也没有改变上层阶层的这种自我再生产特征。“特别是权力优势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其再生产的能力不仅远远超出了自身流动的能力,而且与其他阶层相比较也远超出其他阶层。无论在改革前,还是在改革后,虽然中国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关系存在着一定的流动性,但相对于流动性来说,阶层的继承性或复制能力远强于它们的流动性”(李路路,2002)。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对中国社会近50年来人们社会地位获得的研究中,学术界存在着重大的解释性分歧。从“去阶层化假设”到先赋性因素具有某种程度的影响,再到“封闭性”结论的得出,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就使我们对以下几个问题不得着力探究:

第一,当代中国是一个封闭型社会还是一个开放型社会?是先赋性因素为主要的家庭背景决定个人的社会地位获得与阶级身份,还是个人后天的努力决定其社会地位的获得过程?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在传统社会主义阶段——尤其是“文革”时期,是一个“去阶层”的平均主义社会还是一个层级化社会?

第二,家庭对子女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是否因为性别的不同而发生了不同的作用?换言之,自1949年建国以来,在中国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获得过程中,家庭对下一代的社会地位获得,是否存在重男轻女思想?更为确切地说,是否存在如林南与边燕杰在对天津市研究中的那种发现,即女性的社会地位获得,主要受后致性因素——“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而男性则主要受了继承性因素——父亲的职业地位与就业单位部门的影响(林南、边燕杰,2002:83—115)。

第三,虽然党员身份和受教育水平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社会地位的获得,但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党员身份”和“受教育水平”所起的作用是否相同?也就是说,在“教育资本”和“政治资本”对社会流动共同发生作用的前提下,什么时候“政治资本”对个人向上社会流动的贡献率大?什么时候“教育资本”开始对个人社会地位的攀升增加影响比重?应该说,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学意义。因为,在市场化进程中,虽然一方面“党是一种能够系统干预流动过程的无与伦比的力量”,而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的进行,党在强调教育水平和职业能力”的同时,会在政策作用中培植出为康拉德和萨列尼所刻画的“走向权力道路的知识分子”(Konrad & Szelenyi, 1979)。当然,这个命题在更早些时候,还可以一直追溯到西方新经济制度学派的所谓“专家治国”思想。

二、数据、研究策略与变量介绍

1. 数据获得

本文分析中使用的数据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于2001年所进行的“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调查”数据。该调查分城乡进行随机抽样,总共获得了6193个有效样本。其中年龄在16—20岁者占5.4%;在21—30岁之间者占14.1%;在31—40岁之间者占25.1%;在41—50岁之间者占23.8%;在51—60岁之间者占17.6%;在61—70岁之间者占13.9%。学历分布为:无学历者占8%;小学或初小毕业生占24.3%;初中毕业生占34.2%;高中职业高中毕业生占16.7%;中专毕业生占7%;大专占6.7%;本科占3%;双学士硕士以上者占0.21%。

2. 基本假设

第一,“制度影响假设”:即制度环境变化将导致社会地位获得影响因素随之变化。

第二,“层级化假设”:在改革以前的传统社会主义阶段,中国也是一个层级化社会。虽然去阶层化过程在短期内存在过,但在较长历史时段中,阶层化也是明晰的。即使是在“文革”时期,父亲对子女职

^① 国际上一般将农民、蓝领与白领作为考察单位,得出的结论是:从农民到蓝领之间、从蓝领到白领之间的流动存在壁垒

业地位的获得也具有显著影响作用。

第三,“工业化假设”:在工业化过程中,社会成员社会地位的获得,将主要取决于后致性因素的影响。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具有相似性,即个人获得的“受教育程度”或其他身份资格,对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要大于先赋性因素的影响。

第四,“先赋性因素显著性假设”:在个人社会地位获得过程中,来自于家庭背景的影响虽然微弱,但也应该与其他工业化社会一样具有显著性。即使在初职地位获得中,因为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失去家长的“帮助”,个人也会在随后的职业变换中,从父母那里获得有效的支持。也就是说,那些能够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帮助”孩子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父母亲,终究能够将这种帮助的潜力转化为现实作用力,并在孩子们“现职或终职地位的获得”中体现出这种作用力。在这一点上,男女两性均会受到父母亲的影响,而不仅是男性。

第五,“阶级出身假设”:家庭的阶级出身会对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发生重大影响。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出身于“有产阶级家庭”或其他被标签了所谓“反动”标记家庭的孩子,会遭受较多的升迁压制。

第六,“教育资本的持久性假设”:在影响社会个体社会地位获得的后致性因素中,教育资本的影响力不仅具有恒久性,而且会越来越大于“政治资本”。只要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稳定而持续,这种影响力就会越来越明显。

第七,“户籍屏障假设”:即户籍制度严重限制着出身于农村的人们们的社会流动。

3. 研究策略

社会地位获得模式的经典范例,是研究父亲的职业地位与受教育程度经由社会传承而对子女的职业地位与教育获得所发生的影响,同时也考察子女初职地位对现职地位获得的作用力。其具体方法是:以回归方程递归模型分析方式,标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标准化系数,并通过比较这些标准化系数之值的大小及统计显著性状况,考察社会地位获得的代际与代内影响。布劳—邓肯模型中使用的主要变量是“职业社会经济指数”和“受教育年限”。但在对中国社会的相关研究中,不同学者在不同理论假设下,新加入了某些变量,比如说,白威廉加入的自变量主要是“阶级成份”(或曰阶级标签),林南与边燕杰加入的自变量是“工作单位部门”和“党员身份”。笔者于此项研究中,根据不同的假设,亦加入或减少了某些自变量,并于下文作“变量介绍”。

因为不同的制度背景对当时就业人员的初始职业(或现在职业和最终职业)获得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本文以初职职业和现职职业所在的年代为基准,将研究时段设计为这样几个具有显著特色的时期:(1)1950—1956年的建国初期;(2)1957—1965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3)1966—1976年的“文革”时期;(4)1977—1991年的改革开放初期;(5)1992年以后的改革中期。本文的目的在于检视不同历史时期的代际与代内影响,分析社会地位获得的主要决定因素。

4. 变量介绍

“职业阶层”的定义:在布劳—邓肯地位取得模型中,社会经济指数是一个中心概念。它由各种职业的社会声望、受教育程度、收入之间的回归方程所确定。遗憾的是,我们很难知道我国各种职业的收入构成,而历次调查中得到的社会声望值又与人们的收入、支配性权力的占有和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因而,学术界最近使用较多的是参考冈索普(J. H. Goldthorpe)的职业分类框架而设定的职业阶层序列。例如,林南与边燕杰在讨论“中国城市中的就业与地位获得”时,就使用了这一方法,将职业阶层由低到高依次定义为:(1)农业;(2)商业;(3)制造业;(4)服务业;(5)办公室工作;(6)行政与管理;(7)专业与技术工作。但笔者认为,行政和管理人员在我国不同历史时期,都较之专业技术人员的社会地位为高。另外,我国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也属于“干部”编制;而私营业主的工作支配性与经济收入也高高在上。故此,我将职业阶层由低到高依次定义为:(1)果农菜农粮农阶层;(2)农村专业户阶层;(3)体力工人阶层;(4)商业服务业阶层;(5)办公室办事人员阶层;(6)专业技术人员阶层;(7)官员、国有企业经理和私有业主阶层。

“受教育程度”：为了使不同年度和不同社会背景之下的被访问者有一个同样可以被社会接受的准则来度量其“受教育状况”，我选择使用被访问者的“最高受教育程度”这个变量。毕竟，文凭是一个固定的指针，不因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太大的变化，而社会也以此标定人力资本的高低。我将“受教育程度”作为虚拟变量处理时，将其区别为这样几个类别：小学及小学以下组；初中高中（包括职业高中）组；中专及中专以上组。

“党员”：党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中国人身份和政治地位的指标。很多研究已经表明，在对人们职业地位流动的影响上，“党员”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该人的“受教育程度”起相同的作用。在数据分析中，“党员”赋值为“1”，“非党员”赋值为“0”。

“工作单位部门”：单位部门是中国人求职中非常重要的选择因素。在改革开放之前，工作单位在某种程度上就直接标志着一个人的身份阶层位置。正因为如此，林南与边燕杰在研究中国城市的就业与阶层流动时，才将工作单位近似地看成一个定序变量，依次定义为：（1）私营企业（个体户）；（2）集体企业；（3）国有企业；（4）事业单位及国家机关。我在数据处理中将工作单位定义为三个类别变量：（1）全民单位；（2）集体单位；（3）非全民和非集体单位。

“家庭阶级成份”是一个虚拟变量。凡是在解放初期被划分为有产阶级或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者，或者在其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贴上“反动家庭”之标签者，都赋值为“0”，凡是在解放初期被划分为被剥削阶级或革命阶级家庭出身者，都赋值为“1”。

“年龄”：这是一个控制变量。在对参加工作的“同期群”作了区别的前提下，本文不想过多涉及这一变量的时变解释。

三、中国人初职社会地位获得的图状

建国 50 多年来，中国人社会地位的取得主要由什么因素所决定？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毕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制度有着不同的规制路径。表 1 较详细地报告了这种因为时段不同而发生的变化。比较表 1 在不同时段的模型系数，我们可以发现：

第一，在 1950—1956 年的政权巩固时期和对非公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及至在 1957—1965 年、1966—1977 年这两个历史时段，“14 岁时父亲职业地位”这个先赋性因素对个人初职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都不显著。但在 1978—1991 年、1992—2001 年这两个阶段，伴随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加深、加快，“14 岁时父亲职业地位”对中国人初职地位的获得不但呈现着明确的影响力，而且还显示着这样的趋势，即市场化程度越高，来自于“14 岁父亲职业地位”的影响力就越大。

第二，解放初期，家庭出身对初职社会地位的获得有所影响。那些出身不好者——出身于有产阶级家庭的子女，能够获得相对较高的初职地位；那些出身好者——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或普通农民阶级家庭的子女，获得的初职地位要稍低一些。为什么解放初期，在人们初职社会地位获得时有产阶级家庭能够为子女提供更多帮助呢？这是因为，一方面，虽然政权的更迭在当时的意识形态评价上打乱了原有阶级阶层的结构秩序，可另外一方面，新中国对旧经济的改造，也采取了相对缓和的手段。在农村，虽然分了地主的田，但仍然给他们保留了与贫雇农分田面积相当的耕地，而富农的土地基本被保留了下来；在城市，虽然官僚资本家的资产被没收，可民族资本家与小资本家仍然经营着他们的企业，他们的子女也仍然在自家的企业工作，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这些“出身不好”阶层的子女，也仍然可以被留在国有企业充任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① 这就是说，虽然先赋性因素中“14 岁父亲职业地位”的作用不显著了，但另外一个先赋性因素——“家庭的阶级出身”却起着很显著的作用。

^① 如果从阶级划分的角度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土改之后的地主家庭，实际上是“阶级出身”家庭，而不是“经济阶级”家庭。而城市的资本家和个体工商户，则在建国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仍然维持了资产与其阶级出身的统一，只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或者对某些个体工商户来说，只是到了“文革”时期，才使其资产与其阶级成份相分离，成为出身阶级。

表 1

中国人初职职业地位的获得(标准回归系数)

初职获得年度	1949—1956 年	1957—1965 年	1966—1977 年	1978—1991 年	1992—2001 年
14 岁时父亲职业地位	0.0296	-0.0250	-0.0053	0.0729 *	0.1575 *
父亲受教育水平	0.0304	-0.0457	-0.0510	0.0436	0.0392
家庭成份(出身好=1)	-0.1646 ***	0.0298	-0.0106	0.0069	-0.0288
自己初职单位部门 对照组=非全民非集体单位					
自己初职全民单位	0.3571 ***	0.0955	0.4375 ***	0.2642 ***	0.1309 ⁺
自己初职集体单位	0.0775	-0.0492	0.1318 ***	0.1629 ***	0.0075
初职时户口类型(非农=1)	0.1147	0.1730 ***	0.0927 *	0.1784 ***	0.2314 ***
自己受教育程度 对照组=小学及小学以下					
中专以上	0.3074 ***	0.4491 ***	0.2379 ***	0.4201 ***	0.2402 *
初中高中	0.2832 ***	0.2366 ***	0.0610	0.1253 ***	-0.0843
年龄	0.0881	0.2563 ***	0.0551	0.0022	-0.0104
性别(男=1)	-0.1289 *	0.0095	-0.0735 *	-0.0598 *	-0.0348
ad R ²	0.492	0.463	0.287	0.427	0.400
N	163	360	636	779	170

注：“***”：P<0.001；“**”：P<0.01；“*”：P<0.05；“+”：P<0.10

另外，“14岁时父亲职业地位”统计影响力的失灵，还在于当时社会发生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流动。获得解放的工人和农民，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增长中，也得到了相当多的流动机会。从1953年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到1964年的第二次人口普查，期间虽发生过因1960年左右的饥荒而造成的城市人口向农村的回流，但城市人口在总体上却增长了64%（从7726万人增长到12710万人），而乡村人口仅仅增长了12%（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2003：99）。这说明，当时有很多农民的子女进城作了工人。因此，在中国人初职地位的获得中，1965年以前先赋性因素的不显著，不是父亲的影响力失去了作用，而是制度转型对不同阶层的人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既给普通百姓的流动提供了机会，也适当照顾了有产阶级的利益。这既与社会事实相符，也与吉登斯等人的看法基本相同，即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之初，会创造出更多的平等机会，为普通百姓的社会流动提供支持。从统计意义上说，白威廉通过对移民到香港的那些人的调查所得出的结果，也能给我们提供借鉴，但却不能因此而得出“文革”时期是“去阶层化社会”的结论。后文在分析到社会个体体现职（包括终职）职业地位的获得状况时，会给出专门说明。在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1949年以前的所谓“有产阶级家庭”对子女初职地位获得的正向影响作用就消失了。这说明，作为符号化与标签化的“家庭阶级成份”，开始对子女职业地位获得表现其直接的负面影响力，开始通过一系列制度和社会环境的设置而消除那些出身不好的子女的社会流动优势。

第三，虽然“受教育程度”与“初职单位部门”对人们地位获得具有长期影响力，但在不同历史时段，这二者的影响幅度存在区别。在1949—1956年这个时段，在“全民单位就业”就能够获得相对较高的职业地位；但在1957—1965年这个时段，“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力大于“初职单位部门”。在1966—1976年的“文革”时期，能够在全民单位工作，无疑比能够接受较高的学历教育更重要。但在1977—1991年这个时段，“初职单位部门”的影响力就回落了，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力则开始增长。应该说，这是一个极有意思的发现。在单一的计划经济框架中，“单位制”垄断了社会的绝大多数资源，单位的级别、能够支配资源的能力，甚至于人们所在单位的国有化程度，成为影响人们社会地位获得的重要因素。一个人取得了较高“文凭”，但没有进入一个有权力的单位，他（她）的职业地位的升迁就会受到影响；一个人文凭较低，却进入了一个级别较高的工作单位，或者进入了一个能够支配较多资源的单位，那么，他的初职

社会地位就可能较高。而“文革”时期,则正是“单位制”得以扩张的时期。在1978—1991年这个时段之后,“初职单位部门”的影响力开始低于“受教育程度”。

另外,即使在“文革”对知识分子的发展制造了某些不利影响的情况下,人们初职地位获得的决定因素中,“受教育程度”的作用力也很显著——受过中专以上教育的就业者,明显具有较高的职业地位。即使是在1966—1977年的“文革”时期,受过“中专及中专以上教育”的那些人的初职职业地位,也要高于学历较低的那些人。周雪光等人的研究也发现,在“文革”时期^①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在第一职业的获得中,能够作“干部”的几率越大(周雪光等,2002)。他们将这个原因归于“红卫兵中的大多数是大中专毕业生”这个现象。从当时的社会环境状况来看,该说是合理的。

第四,从性别上来说,除1957—1965年和1992—2001年这两个时段之外,女性的初职职业地位似乎要高于男性。也就是说,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女性会由于自己性别的影响而在初职职业地位的获得上占据某种程度的优势。这可能源于社会就业政策对女性的某种照顾,即在对某些强体力工作或脏乱差工作的安排上,相对照顾了女性的性别特征,不安排其到这些岗位就业。但在1992年之后,伴随就业环境竞争压力的增加,女性的这种优势就消失了。

第五,城乡壁垒的制度设置——户口制度,长期以来都影响着中国人职业地位的获得。那些因为出身于城市或城镇而具有非农户口的人,比出生在农村因而被强制安排了农业户口的人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较好的工作,并升迁到较高的社会阶层。在表1中,各个不同时间段的模型向我们清楚地展示了这种影响。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之后,户口的作用就变得极其显著。而在此之前的1949—1956年这一时段,人们因可以自由迁徙,故其作用并不显著。直到现在,户口这一制度性设置仍然对个人的就业和社会发展产生着不公平的影响。

由此分析可以看出,在对子女初职地位获得发生影响的先赋性因素中,来自于先赋性因素的影响(14岁时父亲的职业地位等),在改革以来具有统计影响意义。

四、中国人教育地位的获得

教育是一个比较恒定地对人们的社会地位获得起干预作用的变量。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教育这个变量的作用幅度有所变化,但教育获得高低决定人们社会地位高低的推断却一直成立。在布劳—邓肯研究社会地位获得的初始模型中,教育对人们社会地位的获得就起着最重要的支持作用。所以,考察教育获得的代际传承,有利于我们理解社会流动的主要脉理。从表2可以看出,建国以来中国人教育获得的高低,不管在哪一个历史时段,都深受父亲职业地位的影响,也就是说,父亲的职业地位越高,人们获得的教育文凭也就越高,其所积累的教育资本或人力资本就越高。具体如下:

第一,在1949—1956年时段,“父亲的教育水平”这个先赋性因素虽不显著,但“14岁时父亲职业地位”却极其显著。从现在出版的许多回忆录里便可以看出,解放初期的“干部阶层”,大多都能够将自己的子女送到比较好的学校读书——这是教育获得的代际影响。另外,考察当时人们的受教育机会,就会发现党员和干部进入更高学校的几率远远多于非党员。从建国前夕的“人民革命大学”到建国后的“工农速成学校”和“半工半读学校”,再到“条条道路通向高等学校”的“调干生”,党员和干部得到了很多照顾。与其说受教育机会偏向于工人阶层或农民阶层,还不如说更多地倾斜于干部和军人^②——这是教育获得的代内影响,也即自己既已获得的身份对自己教育资本累积的影响。

在这一时期,阶级出身是一个极其显著的自变量。因为在建国初期,国家并没有将阶级出身作为是否可以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择录标准,那些在建国前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父母亲,可以将自己优越

^① 周雪光所指的“文革”时期,在统计分析的时间区间划分中,指的是1966—1979年,而不是通常说的“十年文革”(1966—1976年),因为在周的假设中,1977—1979年国家不同程度地执行着“文革”的政策。

^② 在1950—1953年间,我国高中毕业人数明显少于大学招生人数,这就为革命军人、国家机关干部、少数先进工人和极少数先进农民进入高校参加学习提供了机会(这部分人被称为调干生)。比如说,1952年高校实际招生人数是当年高中毕业总人数的2倍多。在工农速成中学经过短训的军人和干部成了填补空缺的制度性生源(参见李强主编,1999:159)。

的阶级地位,通过教育传承给子女。统计表明,直到1956年9月,大多数大学生仍然出身于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家庭:在高等学校本科在校学生中,只有34.2%的人出身于工农;在包括中国科学院系统在内的在读研究生中,只有23.4%的人出身于工农(李强主编,1999:156;费正清,2000:346)。虽然“反右扩大化”使一大批知识分子及其子女处于不利位置,可是大学考试制度仍然实行精英教育模式。当时并行的精英教育和平民教育的双轨制度起着两种不同的作用:精英教育使人们的社会地位获得形成等级,平民教育使全民的文化水平与素质得到提高。所以,那些注重教育的知识分子及其他阶级成份不好的家庭的子女,仍然能够在“文革”前得到较多的机会,获得较多的教育资本。

第二,1957—1965年,在新政权稳定之后,“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解释力就增强了。那些父亲接受过较高教育的人,也使自己的子女增加了教育资本。“家庭阶级成份”也还显著,但其显著性水平减弱了。这表明1949年以前的那些“有产阶级”家庭的教育传承优势,正在社会主义新制度的形成和稳定过程中逐渐消退。

伴随教育制度对城市和城镇的重视,使得越是在中心城市出生的孩子,越能接受比较好的教育,而偏远地区及农村的孩子与城市同期群孩子相比,所受教育的差距拉大了。所以,一方面是平民教育政策的实施,是扫除文盲的运动;另一方面却是精英教育,是那些接受过较好教育的孩子们向大学的进入,是大中专学校分配的学生的干部化。而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的孩子比农村的孩子获得了较多的机会。

表2 教育获得的决定(标准回归系数)

分参加工作年度	1949—1956年	1957—1965年	1966—1977年	1978—1991年	1992—2001年
14岁时父亲职业地位	0.2778 ^{***}	0.1749 ^{***}	0.2350 ^{***}	0.2114 ^{***}	0.1964 ^{***}
父亲受教育水平	0.0812	0.1233 ^{***}	0.0667 [*]	0.2134 ^{***}	0.2211 ^{***}
家庭阶级成份(出身好=1)	-0.2212 ^{***}	-0.0851 ⁺	-0.0590	-0.0197	0.0034
14岁时居住地点	-0.1006	-0.2174 ^{***}	-0.1680 ^{***}	-0.1331 ^{***}	-0.1149 [*]
年龄	0.0519	0.1655 ^{***}	0.0174	0.0604 ^{***}	0.1625 ^{***}
1男,0女	0.1526 ^{***}	0.2107 ^{***}	0.2087 ^{***}	0.1377 ^{***}	0.0678
adj R ²	0.216	0.255	0.192	0.218	0.208
N	321	738	1249	1570	480

注1.“***”:P<0.001;“**”:P<0.01;“*”:P<0.05;“+”:P<0.10

注2.14岁居住地点赋值为:“1”=城市;“2”=县城;“3”=建制镇镇区;“4”=农村。

第三,在1966—1977年时段,父亲职业地位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解释力有了很大的增强,而“父亲的受教育程度”的解释力则有所下降。“根正苗红”的那些人,能够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而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的子女,则在前一时期的“反右”运动和这一时期的“文革”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譬如说,招生制度在“文革”中就有了明确的变更。“文革”初期的1966年6月1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了高等教育部党委《关于改进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同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认为在此之前高校的考试招生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同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强调,“取消考试,招生采取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在“文革”使高等学校停止招生多年后,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指出招生应该“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自此开了“走后门”的先河,使能够接近教育资源的那些人为子女入学大开了方便之门。为此,1972年中共中央不得不发出《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但怎么能够禁绝此路呢!这种制度的执行结果,一方面限制了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进入大学(比如说知识分子、右派的子女),另一方面也使一部分父母亲文凭不高,但却拥有较高职业地位的人为子女安排了入学机会。显而易见的是:户籍和居住区位仍然影响

着人们的教育获得,因为人们的“居住地点”仍然是一个极其显著的变量。^①

第四,在1978—1991年时段,“父亲受教育水平”的作用力,较“文革”时期有所提高。那些受过较好教育的人,自“文革”中下放劳动锻炼后被解放回城,其子女也得以获得受教育机会。而职业地位较高的人,也在高等教育招生工作的改革中,能够为自己的子女创造较好的条件,使其接受较高等级的教育。自此开始,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也就越高。不仅如此,“父亲受教育水平”这一因素对“子女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力,也在1978年以后超过了“14岁时父亲的职业地位”的影响力。这预示着“受教育水平”较高,但“职业地位”相对较低的那些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教育传承,为子女创造比较好的受教育机会,并通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使子女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

第五,在1992—2001年这个时段表现的统计趋势,基本与1978—1991年时段相同。虽然伴随9年制义务教育的实施,中国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有所上升,但20世纪90年代初期高等学校招生过程中学费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又影响了贫困家庭子女的入学。这表现在地区差距上,就是“14岁时的居住地点”这个变量仍然显著,即农村的同期群孩子们,仍然因为自己的出身和家庭背景而不能与出身于城市的那些同期群孩子接受同样的教育。这种受教育机会的不公平,不是个人的原因所引起的,而是由社会制度的分割状况所引起的。综合分析中国人的教育获得情况,我们可以看出:“14岁时的居住地点”一直是一个极其显著的变量。这说明越是在远离城市的地区、乡村,同期群的孩子们获得的教育文凭就越低;而越是在大城市的出生同期群,孩子们获得的教育文凭就越高。

第六,性别之间的统计分析还显示,在各个历史时段,男性都较女性获得了较多的教育机会及结果。这表明,中国人的性别歧视状况是存在的。在家庭教育策略中,人们会更多地“安排”自己的儿子获得较高的“受教育水平”。直到90年代以后,男性的这种性别优势才在9年义务制教育的大力推行中基本消失(当然也存在计划生育所导致的家庭子女数迅速减少这个因素的影响)。

综合比较“14岁时父亲职业地位”和“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两个先赋性因素对子女教育资本获得的影响权重,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历史时段,这两个值的高低有很大波动,但基本趋势为:在“文革”以后,“父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教育资本获得的影响力超过了“14岁时父亲职业地位”。因而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以后,父亲的受教育程度比父亲的职业地位更能够决定子女教育资本的获得。

五、中国人就业单位部门的决定因素

在计划经济时代,一个人如果能工作于所有制性质较高的“核心经济部门”——比如说全民单位,那么,其从工作单位获得的住房及其他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都会高于集体单位和农村。所以,代际和代内社会流动的趋向,一方面表现为从农民向集体工、再向全民工和干部的流动;另外一方面也表现为从集体单位向行政级别较低的全民单位再向行政级别较高的全民单位的流动。

1. 初职就业单位部门

为我们所标定的后致性变量——“受教育程度”,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大多能够对个人能否到全民单位工作发挥显著影响。但在1977—1991年这个时段却是个例外,大约是受了“子女顶替”政策的影响。因为在“文革后”这一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全民单位工作的那些人中,有很多人以子女顶替自己为条件而退休了。因而,这一时期父亲在全民单位工作的那些孩子们初职进入全民单位的发生比非常高($\text{Exp}(B)=14.07$),这预示着与“父亲在非全民非集体单位工作”的那些人相比,“父亲在全民单位工作”的那些人有更高的概率进入全民单位。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所谓“单位制”的影响。一个企业或单位,如果父母亲在这里工作,那么,其通过多种关系将自己的子女“安排”进这一单位的可能性就比较

^① “文革”开始以后,大学基本停止了招生,中学移交给工厂、街道或者农村人民公社办理,废除留级制度,使原来以考试为基础的知识精英教育转变为以推荐和免试为基础的阶级教育和权力支配教育。虽然普通工人和农民在“文革”初期增加了受教育的机会,但在随后的制度变形中,却基本丧失了机会优势,那些权力在握的社会成员,不仅能够招工、参军等地位升迁中照顾自己的子女或其他亲属,而且还可以在推荐入学中安排自己的子女进入高等学校。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所谓工农兵大学,也存在着权力对大学教育机会的侵蚀。

大。但在 1992—2001 年这个时段, 由于国有企业的亏损, 也由于企业减员增效战略的实施, “父亲在全民单位工作”的影响力就不具统计推断意义了。

此外, 考察 1978—1991 年这个时段的非标准回归系数, 我们还可以看出这样一个极有意思的问题: 一是在这一时期, “14 岁时父亲的职业地位”和“家庭阶级出身”(是负值)具有统计推断意义; 二是“父亲的受教育程度”是正值且具有统计推断意义(参见表 3)。这就是说, 那些在 14 岁时“父亲的职业地位较低”、家庭出身不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错化为“右派”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 在自己 14 岁时, 大多处于“文革”时期)、而父亲又具有较高受教育程度的孩子们, 在这一历史时期, 更易于进入国有企业工作。这一方面可能源于平反昭雪后政策的落实; 另外一方面可能是这一时期的大学升学制度, 使得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亲, 将自己的孩子较多地送进了大学, 并通过大学的渠道, 为自己的孩子们谋取到了全民单位工作的入场券。

2. 现职就业单位部门决定

看表 4 可以发现, 现职是否仍然在全民单位的取决因素, 主要在于自己的“受教育程度”和“父亲在全民单位”。那些取得了“中专及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 更易于进入全民单位工作。即使是在“文革”时期, 取得了“中专及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那些人, 也比取得了“初中/高中”文化程度的那些人易于进入全民单位工作。

表 3 中国人初职单位部门的选择(逻辑斯特非标准回归系数)

	1949—1956 年		1957—1965 年		1966—1977 年		1978—1991 年		1992—2001 年	
	B	Exp (B)	B	Exp (B)	B	Exp (B)	B	Exp (B)	B	Exp (B)
14 岁时父亲社会地位	0.07	1.07	-0.04	0.96	-0.01	0.98	-0.08 **	0.92	-0.02	0.97
14 岁时父亲单位部门 对照组= 非全民非集体单位										
14 岁时父亲在全民单位	0.09 *	1.09	0.60	1.82	1.11 ***	3.06	2.64 **	14.0	0.58	1.78
14 岁时父亲在集体单位	-1.07 *	0.34	-0.54	0.57	-0.12	0.88	0.34	1.40	0.52	1.62
父亲受教育程度	-0.12	0.87	-0.04	0.95	-0.05	0.94	0.01 **	1.01	0.10	1.16
家庭阶级出身(出身好=1)	0.17	1.19	0.00	1.01	0.25	1.29	-0.24 **	0.78	-0.65	0.52
自己受教育程度 对照组= 小学及小学以下										
初中和高中程度	2.19 ***	8.96	1.28 ***	3.60	0.52 **	1.68	1.20	3.34	2.02 *	7.58
中专及中专以上	2.95 ***	19.18	1.88 ***	6.59	1.26 ***	3.55	2.92	18.5	2.91 **	18.52
年龄	0.14 ⁺	1.16	0.22 ***	1.25	0.12 ***	1.13	0.02 *	1.02	0.15 ***	1.17
性别(男=1)	-0.42	0.65	0.47	1.61	0.10	1.10	0.60	1.82	0.49	1.64
常数项	-9.06 **		-13.48 ***		-7.13		-3.7 **		-7.1 **	
-2 LL	175.58		329.43		773.06		726.6		187.9	
N	144		329		643		766		169	

注: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P < 0.10$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 在“文革”时期, 即在 1966—1977 年这个时段, “14 岁时父亲单位部门”对子女进入全民单位有着重要的影响。尽管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 曾经使这一时期的很多城市青年走向了农村那个“广阔的天地”, 但在他们更换工作的过程中, 那些在全民单位工作的父母亲, 还是这样或那样地帮助了自己的子女, 使其也进入了全民单位, 从而规避了沦落为农民的危险。

从家庭阶级出身来说, 在 1957—1965、1966—1977 年这两个时段, 那些“出身好”——出身于工农和干部家庭——的子女, 更易于进入到国有单位工作。但在 1949—1956 年这个时段, 出身工农和干部军人家庭的子女, 进入全民或国有单位工作的统计显著性却并不存在。改革以来, 这种显著性也消失了。这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估计: 虽然“有产阶级”家庭的子女, 在建国初期(1949—1965 年)获得了相对较高的教育资本, 但在 1957 年到 1977 年这一长达 20 年的历史时期, 却遭受了相对较多的就业歧视, 不能更多地进入全民或国有这样的核心部门工作。如果说在建国之初的 1949—1956 年时段, 其还可以通

过进入非国有部门取得相对较高的初职职业地位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其获得较高初职地位的可能性也就被制度性地消除了。但出身较好的那些子女,则能够借助国家政策的帮助,在1957—1977年这个长达20年的历史时期,获得较多的机会,进入全民单位。

表4 中国人现职单位部门的选择(逻辑斯特非标准回归系数)

	1949—1956年		1957—1965年		1966—1977年		1978—1991年		1992—2001年	
	B	Exp(B)	B	Exp(B)	B	Exp(B)	B	Exp(B)	B	Exp(B)
14岁父亲单位部门	0.0790	1.08	0.13*	1.13	0.09	1.09	-0.02	0.97	-0.097	0.99
14岁父亲单位部门 对照组=非全民非集体单位										
14岁父亲在全民单位	1.22**	3.40	1.08**	2.97	1.44**	4.23	2.27**	9.71	1.20***	3.35
14岁父亲在集体单位	-0.88**	0.41	-0.217	0.80	0.09	1.09	0.28	1.33	0.20	1.22
父亲的受教育程度	0.0438	1.04	0.05	1.06	-0.03	0.96	0.01	1.01	0.05	1.05
家庭阶级出身(出身好=1)	-0.05	0.95	0.52**	1.69	0.32*	1.38	0.17	1.19	-0.21	0.80
自己受教育程度 对照组=小学及小学以下										
初中高中	1.16**	3.19	1.35**	3.88	1.20**	3.33	1.21***	3.37	1.27	3.58
中专以上	1.34**	3.84	2.27**	9.03	2.83**	17.9	3.65***	38.48	3.19***	24.36
年龄	0.23***	1.26	0.16***	1.18	0.11**	1.11	0.08***	1.08	0.0413	1.04
性别(男=1)	0.3609	1.43	0.11	1.12	-0.20	0.81	0.01	1.01	0.1621	1.170
常数项	-16.01*		-11.7*		-7.8**		-6.57**		-4.9***	
adj R ²	253.91		571.6		1054.0		1148.1		382.84	
N	240		594		1100		1377		409	

注:***, P<0.001; **, P<0.01; *, P<0.05; “+”, P<0.10

综合分析表4和表3,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949—1956年时段的建国初期,一个人之所以能够进入全民单位就业,主要在于自己获得过较高的教育文凭。但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父亲的职业地位”、“父亲的单位部门”与“自己的受教育程度”共同成为影响人们进入全民单位的主要指标。而比较各个时段这三个自变量值发生比的大小还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之后,来自于父亲单位部门的影响开始减弱,而自己“受教育程度”的作用力则有所加强(尤其是在对初职单位部门的影响上,更是如此)。伴随国有企业的亏损和减员,也伴随国有企业和国家公务员进入标准的改变,大学生由干部部分配制转变为毕业就业制,教育资本与考试就成为就业竞争中最主要的先决因素。

六、中国人现职地位获得的决定因素

在职业生涯中,人们的初职地位、受教育程度,以及父亲的职业地位等,对本人现职职业地位的获得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正因为这样,每一个分析现职职业地位获得的模型,都不能缺少这几项变量。但是,在不同的理论假设和不同调查取样背景下,增加或减少某些变量就对模型确定系数的变化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实行户籍制度以来,城乡壁垒不仅对人口的地域流动形成限制,而且对人们职业地位的升迁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在表5各时段模型中,我除了加入了白威廉、林南和边燕杰等使用的自变量之外,特别增加了“户籍”项。综合分析各模型,可以发现(见表5):

第一,这里的结果,基本与布劳—邓肯所发现的美国人的职业流动和地位获得状况相似^①,从包含有“全部案例”的模型可以看出,“14岁时父亲职业地位”^②对中国社会成员现职(终职)地位的获得,有着显著而微弱的直接影响。虽然在有些时段,这种影响并不具统计推断意义,例如,对1957—1965年获得现职的同期群来说,其系数就不显著。但这个历史时段比较特殊。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① 布劳—邓肯当时主要考察的是美国男性的社会流动状况。

② 布劳和邓肯在其研究中,使用的是“本人16岁时父亲职业”。

之后,1960年前后的大饥荒,不但给国民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造成过严重创伤,而且使原来过分膨胀的非农人口大幅缩水。统计数据表明,大跃进后全国吃商品粮人口的精简,使城镇人口从1961年到1963年6月共减少2800万人(王桧林,2003:185),这严重影响了该时期正常的社会流动。这一时期的“反右运动”,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子女职业地位的获得,因为父亲是“右派”的那些人,在现职职业地位的获得中,也多多少少地受到了不利影响。另外,在“文革”时期,子女现职(终职)社会地位获得中来自于父亲的影响作用,却显著了起来。这说明,虽然在初值社会地位获得过程中,由于当时推行的政策性因素的影响,父亲的“贡献”作用没有显示出来,但经过职业转换或工作调动等,居于较高社会地位的父亲(或母亲等),还是有效地帮助了自己的子女,使其在现职(终职)地位获得中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维持了他们阶层地位的代际继承性,也再生产了社会的层阶化结构。

表5 现职职业地位决定

	全部案例	1957—1965年	1966—1977年	1978—1991年	1992—2001年
14岁父亲职业地位	0.0560 *	-0.0087	0.1203 *	0.0722 *	0.0766 *
父亲受教育程度	-0.0047	-0.0268	-0.0767	-0.0433	0.0209
家庭阶级成份(出身好=1)	-0.0062	0.0163	-0.1291 *	-0.0506	0.0300
户口(非农业户口=1)	0.1574 ***	0.2334 *	0.2574 ***	0.1399 ***	0.1478 ***
自己受教育程度 对照组=小学及小学以下					
初中高中	0.1121 ***	0.1519	0.1418 *	0.0203	0.0891 *
中专以上	0.2263 ***	0.1845	0.2355 ***	0.2265 ***	0.2376 ***
是否党员(是=1)	0.2061 ***	0.2225 *	0.2650 ***	0.1364 ***	0.1740 ***
现职单位部门(全民=1)	0.0503 *	0.0506	0.1246 *	0.1126 *	-0.0889 *
自己初职职业地位	0.0970 ***	0.1749	0.0668	0.1444 ***	0.0301
年龄	0.0158	0.0148	0.1681 *	0.0505	0.1007 **
性别(男=1)	0.0189	0.0501	-0.0200	0.0207	0.0077
adj R ²	.199	.375	.418	.233	.197
N	2009	86	190	370	1333

注1. “***”: P<0.001; “**”: P<0.01; “*”: P<0.05; “+”: P<0.10

注2. 1950~1956年时段被省略了,因为这一时期更换工作的案例太少,不能在总体上形成统计推论。

第二,家庭的阶级成份,在“文革”时期显示出了统计显著性。这表明,传统社会主义对“出身不好”的人的确形成了就业歧视。因为在“初职职业地位”的获得过程中、在“受教育程度”的获得过程中,解放初期的“有产阶级”家庭,为其子女创造了比较好的环境和机会,但在现职职业地位的获得中,家庭的支持性背景作用不但消失了,而且在“文革”时期还出现了负面影响,即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同期群成员,仅仅因为其阶级出身而不得不被强加了相对较低的职业地位。这是因为,在“一大二公”的历史背景下,出身不好家庭子女同期群现职或最终职业(退休前职业)的获得,一方面在国家和单位制定的倾斜性政策中(向贫雇农和工人倾斜),受到某种程度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也在政治运动中多多少少地受到了牵连。例如那些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就可能更多地被“上山下乡”政策所左右,也可能更多地被安排在不容易升迁的职位上,更可能较多地随自己父母亲下放到农村。

第三,“户口”、“自己的受教育程度”、“党员身份”和“自己的初职地位”^①、“自己的现职单位部门”是5个极其显著地决定中国人现职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变量。一般来说,有城市户口者获得的现职职业地位高于被农村户口所限定的人员;教育资本较高的就业者获得的职业地位高于教育资本较低者;党员的职业地位高于非党员;初职职业地位高的那些人更能够流动到较高的职位;而就业单位部门则更具历

① 在解释初职职业地位对现职职业地位的影响时,蔡瑞明和林大森在《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连接:以台湾的教育分流为例》一文中,曾经提出了“FFP”(Firm's First Position)假设,即认为在对现职职业地位的影响上,一个人在目前工作单位取得的第一个职业地位比初职职业地位更大一些。但我们的调查没有收集到这方面的信息。我的文章中某些时段初职职业地位对现职职业地位影响不显著的原因,除就业制度环境变化这个因素之外,也可能存在没有使用“FFP”这个变量的原因。

史时变性,因为在1992年之后,在全民单位就业的那些人的现职职业地位,就并不必然地高于在非全民单位就业的那些人。虽然“公务员”仍然是大学生们极力追求的工作,但从总体上来说,国有部门从业人员的减少,使大学生当中的很多人不得不到体制外就业,从而形成1992年之后的所谓外资企业中的“高级白领”,或最近一个时期媒体经常谈论的所谓“具有小资情调”的阶层。

另外,在不同的时段,这4个变量影响力的大小时有波动,显示着制度背景作为一个隐含变量对各个模型的干预。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前提下,讨论“自己的受教育程度”与“是否党员”之间的关系很有意思。因为这两个变量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教育资本”与“政治资本”对中国人社会流动和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力。在1957—1965年的“文革”前时期和1966—1977年的“文革”时期,“自己的受教育程度”比“党员”的影响力要小些。这一方面预示着解放初期党员更易于被提拔到较好的岗位,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文革”时期的政治挂帅政策,重出身、重立场、取消考试制度而落实推荐上学政策,解放军、工人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政策的执行等,使得“党员身份”所代表的政治资本保持着很重要的位置。而在1978年之后,虽然“党员身份”仍然显示着很重要的作用,但在干部队伍知识化、年轻化政策的影响下,那些是“党员”而又有知识的人就易于得到提拔,这表示教育资本开始显现其更加重要的影响力。正因为如此,在各级领导岗位上的干部,才通过各种培训渠道,增加自己的人力资本,在工作后不得不到教育再生产的学校去重新“充电”。这表现出在1992年之后,伴随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教育资本”在社会分配中所占的权重进一步加强,尤其是20世纪末期倡导的所谓“知识经济”等,使得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在技术升级中更易于升迁到较高的工作岗位。因而,“受教育程度”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因素。^①但教育资本的显著性,主要体现在获得过中专或中专以上教育程度的那些人身上,即是说,只要一个人取得了中专以上的文凭,那么,他(她)就有更多的可能爬升到较高的社会位置。

第四,在1991年之前,“现职单位部门”对个人现职职业地位起着正向支持作用,即那些在全民单位工作的人员,比在非全民单位工作的人员的社会地位要高。但在1992年之后,“现职单位部门”对职业地位获得的解释方向发生了转变,那些在全民单位工作的人,反而降低了职业地位。^②另外,伴随外资企业高级白领与私营老板社会地位的上升,国有企业职工的收入和地位却有所下降。所以,国有企业的技术人员才开始大规模流失。现在的趋势是:在职业地位的获得过程中,一方面是单位级别的重要性在下降,另外一方面也是经济所有制中公有制的重要性在下降(边燕杰、罗根,2002)。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性建议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一直是一个层级化的社会,但中国社会的开放性程度有所提高,各阶层的边界仍然需要进一步开放。前文提出的“制度影响假设”、“工业化假设”也得到很好证明。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中国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会有重大的变化。在影响中国人初职与现职地位获得的模型中,后致性因素的回归系数——不管是“受教育程度”还是“党员身份”,都比先赋性因素的回归系数要高。这说明教育等已经成为人们社会地位获得的重要中介变量。布劳与邓肯之所以认为“美国是一个相当开放的社会”,其主要原因是后致性因素——美国人的“受教育程度”在方程中贡献了最主要的解释力。在分时段现职职业地位获得研究诸模型中,教育资本对职业地位的贡献份额越来越大——教育资本的持久性假设也被证明。

本文的研究,不仅在于发现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开放型社会,而且还在于证明“父亲职业地位”仍然具有影响力——“先赋性因素具有显著性”。这与白威廉等人在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虽然在“文

① 这可能预示着政治资本的转化,即党员身份已经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地位等级的变量。很多私营业主的前身,就是国家干部或党员,他们在1992年之后下海经商,成为“体制外官员”。私营业主、个体户、外资企业白领等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也伴随其在国民经济生活中重要性的增加而逐渐提高。最近一个时期的多项职业声望调查都显示,这些群体在民众当中的社会地位都在提高。

② 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抽取的案例,是随机抽取的案例,公务员在这些案例中所占的权重较小。

革”和“文革前”，“14岁时父亲的职业地位”对子女初职地位获得的影响并不直接而显著，但却对现职职业地位的获得具有直接而显著的影响力。另外，父亲的单位部门，也对子女进入现职单位部门有明确影响。所以，先赋性因素的影响是存在的。这就是说，在革命胜利初期的社会大流动中，可能存在过某种程度的平均主义；但在政权稳定发展的时期，我国社会的层级化状况就出现了。另外，人们的家庭阶级出身，这个符号性的标签，也严重影响了社会地位的获得过程。家庭阶级出身“不好”的孩子们，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曾经遭受过强烈的升迁歧视——阶级出身假设得到了证明。

现在，父母亲传承其影响力的主要通道，却开始不再主要依赖不平等的制度性因素（如分割市场中的单位部门等），而转变为对教育路径的依赖。然而，受教育程度的获得，却蕴藏着由教育改革所带来的影响深重的不平等，即以传统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为主的那些人的子女，在高等教育的“高收费”面前，已经不像20世纪90年代以前那样可以与干部子弟或私营业主子弟等凭分数“公平”竞争了。毕竟，货币选票也决定着高考的孩子们的走向。

尽管如此，市场经济的实施，已开始打破传统计划经济所塑造的那种社会结构，也开始打破计划经济时代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向全民所有制性质与级别较高企业单位流动的局面，在体制外初步开辟了新的流动渠道，使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有所提高。现在，对于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而言，他们不是通过国家安排工作，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决定自己的事业。只要打破国家对社会成员流动的某些不公正的制度歧视，那么，中国社会的开放性程度就可能更为提高。

因而，如果以长时段视角观瞻中国建国以来社会地位的获得过程，就会发现，“文革”就像一个巨大的漩涡，但却并没有彻底改变洋流的既定方向。在经济市场化、产业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社区城市化、政治民主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社会流动的渠道会变得疏通起来。布劳—邓肯的工业化假设，在本研究中，被得到充分的证明，即只要工业化在进行，后致性因素对人们职业地位的获得，将日益发挥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

第二，家庭对男女两性子女社会地位获得的主要影响，在于教育投资方面的差异。在教育获得模型的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段（除90年代外），男性都比女性获得了较高的教育程度。林南与边燕杰在天津调查中得出的结论是，女性社会地位的获得，主要受后致性因素——“受教育程度”的影响；男性社会地位的获得，主要受继承性因素——父亲的职业与就业单位的影响的假设，在本次调查中没有被验证。我的结论是：无论男性和女性，子女职业地位的获得，都会受到以父亲为代表的家庭背景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现职地位的获得模型中尤为显著。

第三，在分时段的模型中，虽然“党员身份”为表征的政治资本和以“受教育程度”为表征的教育资本这两个后致性因素，对中国人职业地位的获得都产生着长期而持续性的影响（制度制约下的恒定影响）；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党员身份”与“受教育程度”的作用力却有着此强彼弱的表现。总的趋势是：自改革开放以后，伴随国民经济多种所有制成份的共同发展，也伴随产业技术改造和知识性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教育资本对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作用已变得越来越强烈；而国家机关招聘公务员考试制度的持续性贯彻，也会使官员阶层逐渐知识化。

第四，需要强调的是：户籍制度自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对持农业户口人们的职业流动制造着负面影响，并在今天仍然限制着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过去的职业史影响着未来的就业路径，这对人的一生都会形成难以消除的影响。户籍制度所造成的社会隔离，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福利待遇，而且还严重影响着人们初职地位的获得、教育资本的积累、现职地位的提升。当前中国社会的封闭性，主要表现为制度封闭性。一个人因为出身于农村，他的命运就被国家制度限定在农村，这是我们这个社会当前最大的不公正。城市应该是全国人民的城市，而不应该只是城市人的城市，农民有理由享受城市文明所带来的一切进步。废除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应该是改革中期阶段我们必须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

另外，发展高中阶段的教育，建立学习型社会的重点，应该放在农村。怎样消除地区差异，缓解由于户口制度的壁垒而造成的中国人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不等，应该是社会公正原则下教育资源配置转向的

题中之意。一个人不是因为学习不努力,而是因为出生在农村就必然受招生体制与高等教育的限制,从而使自己难以向上社会流动,这是体制性制造的另外一个不公平。改革的取向,应当是打破这种不公平。由此而生的政策性建议是:国家有必要将9年义务制教育扩展到12年(在农村建立更多的高级中学)。如果在全国范围内(而不仅仅在城市)能够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那么,不仅会更快地增加国人的人力资本,而且还会通过生产过程而增加企业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 边燕杰、罗根, 2002《市场转型与权力的继续:中国城市分层体系之分析》,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费正清, 2000《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
- 李强主编, 1999《生命的历程——重大社会事件与中国人的生命历程》,浙江人民出版社。
- 李路路, 2002《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双重再生产”》,《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林南、边燕杰, 2002,《中国城市中的就业与地位获得过程》,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陆学艺主编, 2002《当代中国阶级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王桧林, 2003《中国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 周雪光、图玛·摩恩, 2002《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阶层的动态分析——1949至1993年的中国城市状况》,载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 2003,《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 Beeghly, Leonard 1996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llyn and Bacon.
- Berry, William D. 1984, *Nonrecursive Causal Models*, Sage Publications, Inc.
- Blalock, H. M. Jr. (ed.) 1972, *Causal Models in Social Sciences*, Aldine Atherton, Inc.
- Blau, Peter & Otis Dudley Duncan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Wiley.
- Duncan, Otis Dudley 1972,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and Achievement*, New York: Seminar Press.
- 1975, *Introduction to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Goldthorpe, J. H. 1987,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ndel, J. D. 1978, *Introductory Statistics for Sociology*,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 Hauser, R. M. & D. L. Featherman 1976, “Equality of Schooling: Trends and Prospect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49.
- Heise, David R. 1975, *Causal Analysis*, John Wiley & Sons, Inc.
- Konrad, G. & Ivan Szeĕnyi 1979,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Jovanovich.
- Palumbo, D. J. 1969, *Statistics in Politic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 Crofts.
- Poulantzas N. 1973, “On Social Classes.” *New left Review* 78.
- Przeworski, A. 1977, “Proletariat into A Class: The Process of Class Formation from Karl Kautsky’s The Class Struggle to Recent Controversies.” *Politics and Society* 7(4).
- Parish William, L. 1984 “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 in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ed.) by J. L. Wat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right, Eric Olin 1979, *Class Structure and Income Determination*, Academic Press.
- Xie, Wen & Lin Nan 1986, “The Process of Status Attainment in Urba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宛丽